

把百姓获得感作为工作出发点——

吉林市“七边”行动暖人心

本报记者 李己平

吉林省吉林市去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他们最宝贵的经验就是把功夫用

到事关百姓利益的小事上，打造让群众更满意、更具幸福感的文明城市。

滔滔松花江呈“S”形穿城而过，冬季树木结晶形成世界奇观雾凇，经济总量保持全省第二，吉林市申办文明城市有硬件、有条件。

但屡屡申办不成，核心问题是老工业基地城建欠账太多。

2020年，吉林市委转变申办理念，专注解决群众痛点难点问题，清理违章建筑，增加停车位解决停车难，清理小广告，还群众空间和清静，这成为吉林市创建文明城市的关键所在。

吉林市委书记贺志亮提出，吉林市巩固创城成果要“继续走边”，实施“城边、镇边、村边、路边、河湖边、林边、田边”环境卫生专项治理行动。

在“七边”行动中，一些原来不被重点关注，又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边缘地，成为常态化管理重点。

家住昌邑区兴华街道中兴社区的吕大爷对各种违建和垃圾深恶痛绝，反映多年没有改观。昌邑区利用无人机航拍等多种方式，对区域内铁路沿线环境卫生无缝隙、全覆盖式排查，已开展4轮铁路沿线集中整治，清除垃圾等废弃物3864吨，拆除围栏、违建157处，安装隔音板。吕大爷对变得干净整洁的铁路沿线十分满意。

“七边”行动提升了乡村颜值，也吸引了商企投资。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乡村旅游经营单位206家，占全省总量的近50%；西小荒地精品民宿项目、壹田新业态农业项目、枫雪部落民宿旅游项目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产业项目正在新建或增加投资。

今年上半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58.29万人次，同比增长239.73%；实现旅游收入49.5亿元，同比增长269.68%。

在群众关心的地方着力，就能受到群众欢迎。不少居民以往喜欢在楼下自建菜园子，往往是利己不利人，现在种花种草绿化环境的方式逐渐被街坊邻居接受。昌邑区新建街道新昌东社

区志愿者在路边花坛植树，不少居民自发从家里拎水前来浇灌。社区书记杨晶说，小区环境变好，居民更加珍爱家园。龙潭区龙潭街道密哈社区有两栋违法仓库，一栋是1974年建的火炕房，一栋是1995年建的解困楼，均存在消防隐患，遮光等情况，不少居民对此不满。经多部门联合推进，包保干部和网格员入户反复劝说，存在了26年的两排仓库最终拆除。社区书记刘宝丽对记者说，涉及群众共同利益的事虽难，但只要真心实意为百姓着想，总能找到办法解决。

建设更高水平文明城市

近日，美国再次上演“有罪推定”的甩锅闹剧。白宫副新闻秘书皮埃尔声称查清新冠病毒源头极其重要，“美和伙伴将继续敦促中国展现更多透明度”。此种“拿着臆造的结论找栽赃的证据”的政治话术，暴露出美方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本质，也反映出美方依旧没有聚焦于全球抗疫合作这一关键问题。实际上，恰恰是美方需要真正提升疫情透明度。

中国一直秉持科学、开放、透明原则与国际社会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和疫情信息，并已两次邀请世卫专家组来华开展溯源调查。联合专家组在考察期间，中方逐条展示了特别需要关注的原始数据，并全力组织相关单位参与，完全满足了联合专家组参与要求。经过实地走访，世卫组织于今年3月公布联合研究报告，为下阶段科学溯源奠定了良好基础。近期80多个国家以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发表声明或照会等方式，明确表明维护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的立场。

美方所谓“敦促中国展现更多透明度”，实质上是典型的做贼心虚。此前已有美研究院分析美民众血液样本指出，新冠病毒于2019年12月即在美出现；中科院预印本平台近期研究发现美首例感染病例大概率出现在2019年9月前后，远早于官方公布的2020年1月20日。面对自身“扑朔迷离”的疫情时间线，美方并未给出合理解释。据美媒报道，美政府已封存2020年1月2日以前采集的血液样本并不再调查。此外，美方至今都未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德特里克堡、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以及“电子烟肺炎”的合理关切。

面对国际社会种种质疑，美政府对在本国开展溯源调查讳莫如深，并企图依靠情报部门“量身定制”的毫无科学性可言的溯源报告为自身开脱。该报告对美国自身存在的上述疑点问题闭口不提，却在拿不出任何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大肆诬称中国“缺乏透明度”“阻挠国际调查”“拒绝共享信息”，其为本国转移视线，同时绑架世卫组织，操控其下一步溯源工作的用心昭然若揭。美方此举只能进一步损害全球溯源科学合作，进一步破坏国际抗疫合作，带来更多的生命损失。

既然美国口口声声强调查清新冠病毒源头极其重要，就请美方一些人立即停止干扰全球溯源，本着尊重事实和科学的态度，摒弃“政治溯源”和“情报溯源”的恶劣行径，直面国际社会的疑问。美方尤其需要立即邀请世卫组织赴美对德特里克堡基地、北卡罗来纳大学等进行科学溯源调查，澄清外界质疑和困惑。只不过，有关呼吁一直未停，美方却置若罔闻，仿佛从来没有这回事一般。到底是谁“缺乏透明度”“阻挠国际调查”“拒绝共享信息”？答案不言而喻。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冬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者吴佳佳)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就进一步做好今冬疫情防控有关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在会上表示，目前，全国疫情整体趋于平稳，前期受疫情影响的多个省份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不过，近期全国多地大幅降温，给核酸检测、流调排查、社区管控等疫情防控工作增加难度。不少专家研判，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形势较去年将更为复杂。

据了解，本轮疫情波及全国21个省份，目前，疫情发生地区正在有序开展核酸检测，快速排查风险场所人群，强化重点人员的隔离管控，并开展医疗救治和感染防控。吴良有介绍，大连疫情近日发展较快，目前处于胶着期，市内个别镇和街道出现社区传播，病例主要集中在庄河市，没有扩散到大连市之外的地区。北京一吉林关联疫情的场所和高风险人群的调查与管控措施正有序进行。



近日，广州市从化区艾米稻香小镇，红霞映稻田，金穗飘香，千亩生态农业与人工智能稻田景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近年来，从化区推进“文旅融合、农旅融合”新模式，打造“网红特色小镇”，把田园风光、农事文化转化为旅游产品、旅游商品，促进乡村振兴。 邱新生摄(中经视觉)

建党百年·经济战线风云录

将土改进行到底

——新生政权彻底终结封建土地制度

□ 本报记者 吕立勤 梁剑箫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由中共中央建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6月28日通过这一草案。6月30日，毛泽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颁布。这一法律的成功颁布，是新生政权彻底终结封建土地制度的关键性举措。

回顾争取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的艰苦斗争岁月，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坚持不懈寻找彻底消灭农业生产落后和农民贫穷总根源的方式方法；始终立足中国实际，千方百计寻找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正确路径和方针办法。1950年冬至1952年底，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推动着广大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自古沿袭的封建制度根基从根本上被铲除，从而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渐扫清了旧有制度障碍。

聚焦革命中心问题，赢得农民建政权

作为国家基础性、根本性、全局性的制度，土地制度构成了生产关系和一切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展开历史的恢弘画卷，浏览有关土地以及土地政策的一幅幅图景，一路走来，我们党一直领导着广大农民坚决地与封建剥削制度作斗争，历经风雨而不屈不挠，始终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将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引领农民谋取解放作为土地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1921年7月建党之初，我们党就主张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提出了最早的关于土地的基本纲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土地革命成为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社会经济内容。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提出“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会议认为，只有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才能使党领导和开展的武装斗争和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获得广泛、可靠的群众基础。

井冈山的土地革命时期，面对复杂变化的革命形势，我们党起草了井冈山《土地

法》，对于农村土地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助推作用。党中央深入调查研究了当地农民生活的基本情况、阶级关系及土地革命的状态，获得大量一手材料，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调查报告。在以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目标的基础上，各根据地陆续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我们党积极发动农民抗日，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调整政策。我们党先后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等中央文件，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具体、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把发展统一战线与解决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适当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级和阶层，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纵深推进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我们党发布“五四指示”，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坚定支持农民土地要求的基础上，斗争策略更加符合客观历史条件，更加科学有效，更加符合老百姓的实际利益。这样，几千年来封建土地制度受到猛烈冲击，农村旧有生产关系得以改变，亿万农民获得政治、经济上的解放，大大改善了农民生活，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为新中国成立后彻底铲除封建土地制度奠定了基础。

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全国还有2/3的地区存在封建土地制度。在新解放区和待解放区，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然严重束缚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据国家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土地改革前，在农村各阶级中，占农户总数不到7%的地主、富农拥有的耕地占总耕地的50%以上，而占全国农户57%以上的贫农、雇农仅占有耕地总数的14%，处于无地少地状态。从新区农村总体情况来看，贫农、雇农和中农虽然耕种90%的土地，但仅拥有少部分土地所有权，承受着很沉重的地租剥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尚未彻底实现，必须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在保护农民已获土地所有权基础上，发动农民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

在新解放区，党和人民政府一方面积极开展反霸斗争，严惩乡村恶霸，建立起农民基本群众占优势的基层民主政权；另一方面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和退押工作，进行“二五”减租并减交农民向地主借贷的一部分高额利息。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民所受的经济剥削有所减轻，农户总数中有50%至70%增加了收入，并加大了生产投入，初步改善了生活。

与此同时，我们党在进一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富农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但是对富农采取什么政策，对农民中其他阶层特别是中农有着直接影响，对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会产生影响。1950年3月，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提到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家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这样，一来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防止发生过左偏向；二来可以更好地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更有利于巩固统一战线。

1950年6月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时，与会者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时提

出了不同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新解放区各地的情况不同，在土地特别少的地区，倘若不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就难以解决大多数贫雇农的最低生活限度问题，因此提议在政策执行层面应有一些机动性。中央认为，上述意见是以不同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为依据，决定在保存富农经济这一基本政策的前提下，对富农多余土地的处理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不搞“一刀切”。

适时颁布法规，指导全国土改

1950年6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颁布。同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政策相比，这一中央文件作出不少新规定。

一是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文件规定要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富农出租的所有小量土地也保留不动。半地主的富农出租的大量土地属于封建性质，凡是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二是由没收地主在农村中的一切财产，改为只没收其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余财产不予没收。三是增加了对于小土地出租者的政策规定。文件指出，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可以视为地主。这些规定，有助于保证土地改革顺利进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

《土地改革法》颁布后，政务院还相继制定和公布《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院组织通则》《关于划分农村

阶级成分的决定》等配套的法规政策。政务院具体规定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等成分的标准，并明确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要依其家庭成分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分要依据获取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

为保证《土地改革法》科学实施，党中央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各大区、省、专区、县人民政府分别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抽调了大批干部，以及不少新解放城市的青年和学生，组织成土改工作队，经过集中培训学习，分批分期下到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很多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过去几乎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民贫苦状况并没有切实的了解，经过参加土改工作队，深获教益，经受锻炼考验，增长了才干，逐渐成长为懂政策、有能力、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

基本完成土改，解放农村生产力

1950年冬天开始，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土改工作队深入广大农村地区，来到农户尤其是贫雇农的家中，一方面从思想观念上帮助他们正本清源，了解清楚地主的发家史、农民的血汗史，让他们充分认识到解放后农民地位发生的明显变化。听完土改工作队成员的讲述，农民们认识到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性，大大提高觉悟。另一方面土改工作队从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的水平差异出发，让广大农民知道如何正确划分富农、中农，澄清了部分群众以为“划阶级就是划分贫富，越穷越光荣”等模糊认识。比如，只有剥削收入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的1/4，才能被认定为富农，由此与富裕中农严格区分，防止错划。在各地农民协会领导下，很多地方

还成立没收征收委员会，召开农民代表会、贫雇农代表会，按照《土地改革法》规定没收和征收的范围，组织农民群众有序、有步骤、有层次地没收地主财产以及征收富农超出规定范围的出租土地。各地再根据自身情况，结合实际确定的分田标准分出亩数、地段、农具和耕畜等，在防止绝对平均主义的基础上力求公平，使贫雇农都获得经济效益。邓小平在1951年5月写给中共中央的一篇综合报告中，提到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写道：“不少地区贫雇农获得了每人一百斤米左右的果实，有的地方相当于中农所得的果实，多数乡村贫雇农取得了农会的主要领导地位。所以，凡属完成了土改的地方，农村基础更加巩固，煮夹生饭的比重不大。”

至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之外，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土地改革充分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直接增加了主要农产品产量。历史数据显示，粮食、棉花、油料这三种农作物，1951年比1950年分别增长8.7%、48.8%、22.4%，1952年又比1951年分别增长14.1%、26.5%、12.5%。1953年农民净货币收入比1949年增长123.6%，每人平均净货币收入增长111.4%；1953年的农民购买力比1949年增长了111%，均户的消费品购买力增长一倍左右；农民的留用粮食1953年比1950年增长28.2%，其中生活用粮食增长8.6%。与此同时，农民的文化需求也伴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而提高。1950年全国农民上冬学的达到2500万人以上，1951年上常年夜校的农民有1100余万人，1952年比1949年的农村在校小学生人数增加111.8%，中学生增加186.2%。

作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历史性标志，此次土改为新中国进一步的经济恢复发展奠定了坚实稳固的基础。1952年4月的《学习》杂志刊登了时任中财委秘书长薛暮桥撰写的《三年来中国经济战线上的伟大胜利》，文中这样写道：“两千余年来统治中国的封建制度，即将全部消灭。全国约有两千万地主除极少数恶霸及居住城市者外，都与农民一样分得一份土地，进行劳动改造，他们中的大部分将逐渐从封建地主变为劳动人民，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又一个巨大的变化。”